

列 寧
論新經濟政策



定價 0.09 元

論新經濟政策

(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在莫斯科省第七次黨代表會議(三)上的報告)

同志們！在開始報告新經濟政策的時候，我首先應當附帶說明的，就是我不是像也許在座的許多人所期望的那樣來理解這個題目的，或者毋寧說，我只能夠就這個問題的一小部分來講一下。很自然地，在這個問題上，主要的興趣也許是朝向考察和評價最近蘇維埃政權關於新經濟政策所頒佈的一些法律及決議。這些決議案的數目愈多，對這些決議案加以定型化、整理和總結的需要性愈是迫切，則對於這個問題發生興趣也愈是應該，——就我根據在人民委員會裏的觀察所能够推斷的限度來說，這種需要性，現在是日益感覺到了。要想熟悉關於新經濟政策的結果問題的已有的事實和數目字的願望，同樣也是應該的。自然，已經證實了的和檢查過的這種事實的數目，還是很少的，然而它們到底是有了。而且，毫無疑義地，爲了熟悉新經濟政策，去注意這些事實，並試圖把這些事實加以總結，也是絕對必要的。但無論前一個題目和後一個題目我都不能夠論述，如果你們對於這兩個題目發生興趣的話，那

末我可以担保，你們會找到這些题目的報告人的。使我感到興趣的，是另一個題目，這就是關於我們因政策的轉變而採用的策略問題，或者說——如果可以這樣來說的話——革命戰略問題，以及對於下述兩個條件加以評價的問題，即：一方面，這種政策跟我們對我們任務的一般理解適應到什麼程度，另一方面，今日黨的知識和黨的意識跟這種新經濟政策的必要性適合到什麼程度。我所願意專門談論到的，就是這個專門的問題。

首先使我感到興趣的問題是，在評論我們的新經濟政策時，在什麼意義上可以說從前的經濟政策乃是錯誤的？將它評定為一種錯誤是否正確？最後，如果這種評定是正確的話，那末究竟在什麼意義上，這種評論可以被認為是有用的和必要的？

我認為，這個問題對於估計現在我們黨內關於我們目前經濟政策基本問題的意見究竟協調到何種程度，是有意義的。

黨的注意力，在現時應當是完全集中在這個經濟政策的一些具體的個別問題上呢，還是這一注意力應當是——至少間或地——用來評論這個政策的一般條件和談論黨的意識、黨的興趣和黨的注意力對於這些一般條件的適應問題？我認為，目前的情勢是這樣的：我們的新經濟政策，對於黨內廣大的羣衆，還不是都充分明白的東西，因此，如果對於先前的經濟政策的錯誤沒有一個清楚的觀念，那我們就不能順利地完成我們創造新經濟政策的基礎以及最

後地確定我們新經濟政策方向的工作。

爲了說明我的意見，而且爲了回答這個問題，即究竟在什麼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而且在我看來應當說，我們從前的經濟政策是錯誤的，我願意擇取日俄戰爭的一段插話，來加以比較。我以爲，這段插話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楚地設想像在我國正在進行的這類革命中各種制度以及政治方法間的相互關係。在這裏，我所說的例子，就是日本乃木將軍攻取旅順的事件。在這個例子中使我感到興趣的主要事情，就是旅順的攻佔曾經經過了兩個完全不同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多次的猛烈衝擊，這些衝擊，結果都歸於失敗，且使這個聞名的日本司令官遭受到空前未有的大量犧牲。第二個階段，乃是轉而依照圍攻術的一切規則，採取了對該要塞的極端費力、極端困難和緩慢的圍攻，可是過了一些時候之後，正是由於這種方法才解決了攻取這個要塞的任務。如果我們把這些事實加以考察的話，那末自然而然地就發生了一個問題：在什麼意義上，我們可以把日本將軍第一次進攻旅順要塞的作戰方式評定爲錯誤的呢？對於這要塞的正面衝擊是否錯誤的呢？如果這樣的衝擊是錯誤的，那末，究竟應當在什麼條件之下，日本軍隊爲了正確地執行它的任務需要承認這是錯誤的，並且在何種程度上它需要來認識這種錯誤呢？

自然，乍一看來，似乎認爲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是很簡單的。如果對於旅順的多次的正

面衝擊，都是毫無結果的，——這是事實，——如果攻擊者以此所受的犧牲是非常巨大的，——而這仍是不可爭辯的事實，——那末由此就可以顯然地看出，對於旅順要塞進行直接和正面衝擊的策略乃是錯誤的，這一點是不需要任何證明的。可是在另一方面，不難看到，在解決其中包括很多未知因素的這樣一個任務的時候，如果沒有相當的實際的經驗，那很難用絕對的或者甚至頗大程度的近似性和精確性來確定，可以使用怎樣的方式去進攻敵軍的要塞。如果不在實踐上體驗一下，要塞的力量如何——其防衛的實力如何，其衛戍部隊的情況如何等等，那末要對這一點加以確定是不可能的事情。沒有這一點，則甚至一個最好的指揮官——乃木將軍無疑地就是這樣的人物——也不能解決採取適當方法攻取要塞的問題。另一方面，全部戰爭勝利結束的目的和條件，也要求對於這個任務加以盡可能最迅速的解決，而同時，即使是很嚴重的犧牲，如果對於用衝擊來攻取這個要塞是必要的話，那終會得到綽綽有餘的補償的，這種事情也是非常可能的。這些犧牲可以使日本軍隊擺脫出來，以便在別的戰場上作戰，而完成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使敵人，即俄軍，來不及把較大的兵力調到遙遠的戰場，把這些兵力訓練得更好，而且也許會達到使它較日本軍隊強大好多倍這樣一種地步。

如果把整個軍事行動的發展和日本軍作戰行動的條件加以考察，則我們將會得出一個結論：對於旅順要塞的衝擊，不僅表示了顯然能作重大犧牲的這一軍隊的最偉大的英勇氣概，

而且也表示了，在當時情況之下，即在作戰行動之初，這是必要而有益的唯一的策略，因為如果沒有在用衝擊方法攻佔要塞這個實際任務上來檢查一下力量，如果不體驗一下敵人的抵抗力，那就沒有根據來採用那種較長久的和較費力的鬥爭，這種鬥爭，正由於它的長期性而含有許多別的危險。從整個作戰行動的觀點看來，我們不能不把這個行動的正面衝擊和攻擊的第一部分看作必要的部分，有用的部分，因為，我再重複說一遍，沒有這種經驗，日本軍隊就不能有了解鬥爭具體情況的充分的知識。當用衝擊方式進攻敵軍要塞的時期告一終結時，這個軍隊所處的情況是什麼樣的呢？成千成千的人倒下去了，還有成千的人要倒下去，但是用這種方法沒有攻下這個要塞——當有一部分人或者大多數人得出結論說，應當放棄正面衝擊，而改用圍攻的時候，這個軍隊的情況就是如此。既然已經判明策略上有錯誤了，那就要丟掉這種錯誤，凡與這種錯誤相關聯的一切，就必須承認是作戰行動的一種阻礙，而必須加以改變：要停止衝擊，改取圍攻辦法，改變軍隊的配置，重新分配軍需品及軍火等，關於個別的方法和作戰行動更不用說了。從前的一切，應當堅決地、確實地、明白地承認是一種錯誤，以便不要在新的戰略與策略的發展上，在作戰行動的發展上造成障礙。這種作戰行動，現在應當完全用別的方法來進行了，如我們所知，這種作戰行動是以完全勝利而告終的，雖然時期要比預定的長得多。

我認爲，這個例子可用來說明，我們的革命，在解決自己在經濟建設領域內的社會主義任務時是處於怎樣的情況中。在這一方面，兩個時期是完全分明地劃出了的。一方面，大約是從一九一八年初起至一九二一年春止這一時期；另一方面，則是從一九二一年春以來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時期。

如果你們回想一下我們黨自一九一七年末至一九一八年初所作的一些正式的以至於非正式的宣言，你們就會看到，那時我們就有一種觀念，認爲革命的發展，鬥爭的發展，既可以循着一條較短的道路進行，也可以循着一條很長而艱苦的道路進行。但是在估計可能的發展的時候，我們多半都是——我甚至記不起有任何的例外——從以下這個假定出發的（這一點或者並不是常常公開表明的，但是這一點總是被默認的），這個假定就是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建設去。我特意把比如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兩月關於我們革命在經濟建設領域內的任務所寫的文章^①，又重新閱讀了一遍，這使我確信，我們在當時確是有這種假定的。

這正是這樣的一個時期，那時，像奪取政權、建立蘇維埃國家制度以代替從前的資產階級議會制度、以及然後退出帝國主義戰爭（大家知道這種退出，曾經帶來了特別嚴重的犧牲和簽訂無比屈辱的、提出了幾乎是不可能接受的條件的布列斯特和約）這樣重大的、在政治方面就必要性說來是先決條件的任務，已經解決了。在簽訂布列斯特和約之後，從一九一八

年三月到夏天這個時期，乃是軍事任務似乎已經解決了一個時期。但是此後的事件表明並不是這樣的，在一九一八年三月間，在帝國主義戰爭的問題解決之後，我們只是接近了國內戰爭的開始；這個國內戰爭，從一九一八年夏天起，隨着捷克斯洛伐克軍團的叛亂，便一步步地更加逼近了。那時，在一九一八年三月或四月，在談到我們的任務的時候，我們已經以這樣的作戰方式，如主要地致力於剝奪剝奪者（而這一點，主要是革命最初幾個月即一九一七年末及一九一八年初的特點）這種鬥爭方法，與逐漸過渡的方法對立起來。那時我們就已經不得不說，我們在組織核算及監督方面的工作，是大大地落後於剝奪剝奪者的工作及活動了。這意思就是說，我們所剝奪的東西，已多於我們所能夠計算、監督和管理等等的東西，因此，便從剝奪剝奪者的任務，從粉碎剝削者及剝奪者的權力的任務，轉到組織核算及監督的任務，轉到所謂平凡的直接建設的經濟任務上來了。那時我們已經在許多點上都需要後退。舉個例來說，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和四月，就提出了像按照適應於資產階級關係，而不是適應於社會主義關係的比率，這就是說，不是按照與勞動的程度或勞動的特別艱苦條件相適應，而是按照與資產階級習慣和資產階級社會條件相適應的比率來給予專家報酬。這種對於專家非常高度的、資產階級式的高度的報酬，原先並沒有包括在蘇維埃政權的計劃以內，而且甚至是一九一七年末發佈的許多法令不相符合的。但是在一九一八年初，我們的黨却頒發了

直接的指示，指出我們在這一方面必須向後退一步，承認某種的「妥協」（我是使用在當時所通用的名詞）。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的決定就承認，在一般的薪資制度上採取這種改變，是必要的（三）。

我們曾經是從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在那時提到第一位的建設工作和經濟工作的。在那時，曾經假定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而無需乎一個使舊的經濟適應於社會主義經濟的預備時期。我們曾經假定，在建立了國家生產及國家分配以後，我們就直接進入了一種與以前的制度比較起來不同的生產和分配的經濟制度。我們曾經假定，這兩種制度——國家生產及國家分配制度和私人商業的生產及分配制度——在我們建立起國家生產和分配，一步步地將它從敵對制度中爭取過來的這種情況下，會相互發生鬥爭的。我們說，我們現在的任務與其說是剝奪剝奪者，不如說是核算、監督、提高勞動生產率、加強紀律等等的了。這是在我們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及四月間說的，但是我們却不曾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的經濟，對於市場，對於商業，究竟將會是怎樣的關係？比如在一九一八年春天，當我們與一部分反對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同志論戰的時候，我們曾經提出了國家資本主義的問題，其意並不是說，我們要後退到國家資本主義上去，而是說，如果在我們俄國有支配經濟制度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話，那末，我們所處的情況就要和緩些，而我們解決社會主義的任務，也會接近些。我願你們對於此種情況

特別地予以注意，因為在我看來，要了解我們經濟政策的轉變是在什麼地方，並應怎樣來估計這種轉變，這一點乃是必要的事情。

我舉一個例子，這個例子可以更具體地、更明白地說明我們的鬥爭在其中展開的條件。不久以前，我在莫斯科曾看到私人辦的一份「廣告小報」^②。在我們的三年舊經濟政策之後，這份「廣告小報」就使人不禁發生一種完全不平常的、絕對新鮮而奇特的印象。但從我們經濟政策一般方法的觀點看來，這兒是沒有什麼新奇的東西的。如果拿這個小的、然而又很獨特的例子來講的話，需要回憶一下鬥爭是如何發展的，以及在我們的革命中，一般說來，它的任務和方法是些什麼。在一九一七年末所頒佈的最初的法令之一，就是對於廣告事業國家獨佔的法令。這個法令包含着什麼樣的意思呢？它含有這樣的意思，即：取得了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假定到新的社會經濟關係上去的過渡是可能較漸進的——不是廢止私人的報紙，而是使它從屬於一定的國家領導，將它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上來。因之，那規定國家對於廣告事業獨佔的法令，曾假定，私人企業性的報紙，作為一般現象，依舊存在下去，需要私人廣告事業的經濟政策，也將繼續存在下去，私有財產制度也將繼續存在下去，需要廣告及廣告事業的一整列的私人企業，都繼續存在下去。關於私人廣告事業獨佔制的法令，其意思就是這樣，而且也只能是這樣。關於銀行事業的法令中，也有與這相似的情形。但是爲了

不要使這個例子過於繁雜起見，我不打算加以論列了。

在蘇維埃政權存在的最初幾個星期之內所頒佈的關於私人廣告事業獨佔制的法令，其命運如何呢？其命運是這樣的，就是它不久就被完全取消了。現在在回顧鬥爭的發展以及從那時以後鬥爭在其中進行的條件時，若依據今日的時代來回想，我們那時是如何地天真，在一九一七年末，我們竟然談到實行對於私人廣告事業的國家獨佔，那是可笑的。在決死的鬥爭時期，能够有什麼樣的私人廣告事業呢！敵人，即資本主義世界，曾以繼續進行鬥爭並將這種鬥爭提到最高的緊張程度和進行到底，來回答蘇維埃政權的這個法令。這個法令曾假定，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專政，已經這樣鞏固，以致於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經濟制度了，服從蘇維埃政權的必要性，對於全體私人企業家和個別所有主已是如此明顯，以致於他們只能在作為國家政權的我們所安置的基礎上來應戰了。我們曾說，私人出版物依舊是你們的，私人的事業心依舊保存下去，供應這些企業所必要的登載廣告的自由依舊保留，只是規定國家對於廣告事業要徵稅，只是規定將廣告事業集中在國家手中而已，如是，私人的廣告制度本身不僅不會受到破壞，而且，相反地，給了你們以某種利益，這種利益，往往是跟報導事業之適當集中有關的。可是事實上結果是我們應當展開鬥爭的地方，完全不在這個場所上面。敵人，即資本家階級，是以完全否定整個國家政權，來回答國家政權的這條法令。根本就談不到任

何廣告事業了，因為在我們制度中所留下的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一切，那時已經把它的一切力量集中於為政權的基礎本身而鬥爭了。我們曾經向資本家們建議：「服從國家的調節吧，服從國家的政權吧，這樣，就可以不必完全廢除適合於居民的舊利益、舊習慣和舊觀點的那種條件，而可以得到用國家調節的辦法來逐漸改變這一切」，但是，人家却給我們提出了關於我們自身生存的問題。資本家階級所採取的策略却是來激動我們作你死我活的無情鬥爭，這種鬥爭迫使我們對舊關係作出比之我們所假定的要大得不可以計量的破壞。

關於私人廣告事業獨佔制的法令，沒有絲毫結果，它依然是一張廢紙而已，生活，即資本家階級的反抗，却迫使我們國家政權將全部鬥爭轉移到完全不同的一个方面上去，並不是轉移到像我們在一九一七年末所天真地處理的這些空洞到可笑的小小問題上去，而是轉移到：存在呢，還是不存在這個問題上去——粉碎昔日薪俸階級的怠工，擊退獲得全世界資產階級支持的白衛軍隊的問題上去。

我認為，這個關於廣告事業的法令的特殊插曲，在關於舊策略究竟錯誤與否的基本問題上，提供了有益的指示。自然，現在在從此後歷史發展的前途上來評價事件時，我們不能不認為，我們的這個法令是天真的，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是錯誤的，但同時這個法令裏面也包含有正確的東西，那就是國家政權——無產階級——曾經作了實行過渡到新的社會關係上

去的嘗試，並且盡可能逐漸地和盡可能沒有特殊破壞地、盡量適應於當時既存的關係。敵人，即資產階級，會運用一切手段，激使我們作最殘酷的你死我活的鬥爭。在戰略上，從敵人的觀點看起來，這是否正確的呢？自然，這是正確的，因為資產階級在這一方面不用直接搏鬥的方法來考驗一下自己的力量，怎樣能突然地服從這個嶄新的、從來不曾有過的無產階級的政權呢？資產階級向我們回答道：「對不起，可敬的先生們，我們和你們談判的，並不是關於廣告事業而是關於我們是否還能夠找到弗蘭格爾、高爾察克和鄧尼金，以及國際資產階級能否給他們以援助，以解決並不是關於你們是否將有國家銀行的問題。」說到國家銀行，這正如關於廣告事業的情形一樣，在一九一七年末我們曾經寫出了很多很多的東西，但是大半都只是一張廢紙而已。

那時，資產階級曾經用一種從他們利益的觀點看來是正確的戰略來答覆我們：「首先，我們是爲了這個基本問題而進行鬥爭的：一般地你們是否是國家政權，或者你們僅僅表面上看來是國家政權，自然，這個問題不是取決於法令，而是取決於戰爭，取決於暴力，進行這個戰爭的人，大概將不僅僅是我們——這些從俄國被逐出的資本家，並且還有一切與資本主義制度休戚相關的人們。如果事情表明其餘的世界都是對此非常關心的，那末國際資產階級將會援助我們這些俄國資本家的。」從保護其利益的觀點看來，資產階級這種做法是很對的。

如果他們對於用最有效的手段——戰爭來解決這個基本問題，還有哪怕點滴的希望，那末，他們就不能同意而且也一定不會同意蘇維埃政權爲了能比較逐漸地過渡到新制度上去，而對他們所作的那些局部的讓步了。「既不要任何過渡，也不要什麼新制度！」——這就是資產階級的回答。

爲什麼造成了我們現在所看見的這種事態的發展，其原因即在此。一方面是無產階級國家的勝利及一種在人民空前興奮的條件下的不平等的鬥爭，這種不平等的偉大乃是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這一整個時期的特點；另一方面，就是將蘇維埃政權的經濟政策付諸實施的企圖，這種企圖起初是打算用一些逐漸的變化，較謹慎地過渡到新制度去，這也表現在我剛才所舉的小小的實例中。但它從敵人營壘中所得到的却不是這，而是這種回答：決心進行無情的鬥爭，來決定蘇維埃政權在國際經濟關係的體系中是否能夠作爲一個國家而保持其地位。這個問題，只能夠用戰爭才能決定，而這個戰爭又是一個極端殘酷的戰爭，像國內戰爭一樣。鬥爭愈是困難，則謹慎地過渡到新制度中去的可能亦愈少。我曾經說過，在這種鬥爭的邏輯當中，資產階級的做法，從他們自己的觀點看來，是對的。但是我們能夠說什麼呢？我們說：「資本家老爺們，不要威嚇我們吧。我們除掉在政治舞台上把你們和你們的『立憲會議』一起打敗之外，還要在這一方面打倒你們。」此外，我們不能再有任何其他的做法。任何

別的作戰方式，都等於我們完全放棄陣地。

你們回想一下這種鬥爭發展的條件吧，那時你們就會懂得何以會有這種看起來似乎是不正確的和偶然的變動；你們就會懂得，為什麼我們依靠普遍的熱忱和已有保證的政治統治，便能輕而易舉地將「立憲會議」解散；為什麼同時我們還應當試用很多辦法，以便逐漸而慎重地過渡到經濟的革新上去，最後，為什麼鬥爭的邏輯以及資產階級的反抗，曾迫使我們轉向最極端的、最激烈的、不顧一切的國內戰爭的方式，——這個國內戰爭，曾經將俄羅斯蹂躪了三年。

到一九二一年春天已經弄明白，我們在想用「衝擊」方式，即用最簡捷、最迅速、最直接的方式過渡到社會主義生產與分配原則的企圖上，已經遭到了失敗。一九二一年春季的政治形勢，曾向我們指出，在許多經濟問題上，退却到國家資本主義陣地去，由「衝擊」轉向「圍攻」，乃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這種過渡引起了某些人的怨言、悲歎、沮喪、不滿，那末必須要指出：危險的並不是失敗，而是害怕承認自己的失敗，害怕從這種失敗當中得出一切的結論。軍事鬥爭，較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鬥爭，要簡單得多；我們所以戰勝高爾察克及其夥伴，就是因為我們不怕承認自己的失敗，就是因為不怕從這些失敗中吸取教訓，就是因為把做得不夠的或

做得不好的工作，一再重新做起。

在社會主義經濟反對資本主義經濟這種更加複雜和困難得多的鬥爭領域內，也必須採取同樣的做法。不要害怕承認失敗。要從失敗的經驗中學習。要把那做得不好的，更縝密、更小心、更有系統地重新做過。如果我們允許這樣的觀點：承認失敗，和放棄陣地一樣，在鬥爭中會引起失望沮喪及削弱力量，那末，我們一定要說，這樣的革命者，是一錢不值的。

我希望，除了個別的情形外，誰也不能這樣來說受過三年國內戰爭經驗鍛鍊的布爾什維克。我們的力量過去在於、而且將來也在於我們完全清醒地估計最嚴重的失敗，從這些失敗的經驗當中學習那在我們的活動當中應當改變的東西。因此，必須要率直地說話。這一點，不僅從理論上真理的觀點看來是有興趣的和重要的，而且即從實踐方面看來，也是如此。如果昨天的經驗還沒有使我們看到舊方法的不正確，那末今天便不能夠學會用新方法來解決我們的任務了。

轉到新經濟政策的任務，就在於在空前困難的條件下，在國內戰爭的條件下，在資產階級以殘酷鬥爭的形式強加於我們的條件下，試驗直接的社會主義建設之後，在一九二一年春季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乃是這樣一種明白的形勢：不是直接的社會主義建設，而是在經濟的許多領域內退却到國家資本主義上去，不是正面衝擊，而是與許多退却相聯系的長期圍攻的極